

The triple logic analysis of digital technology

Lu He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development in digital technology, China's modernization of cultural governance faces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is analysis can be conduct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eoretically,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as outlined by Marxist classic writers, and using the theory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to guide research feasibility; practically,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of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the effective promotion role of digital technology, elucidating new forms faced by China's modernization of cultural governance unde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practically, guiding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mproving legal supervision for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recognizing the essence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such as AIGC, to articulate the path choices for research on China's modernization of cultural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digit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Key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modernization of cultural governance; logic; path

数字技术赋能文化治理现代化的三重逻辑分析

何璐

石家庄铁道大学, 中国·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要

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的境遇下,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立足当下境遇,可以从理论、现实和实践三个维度进行分析:理论逻辑上,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与文化建设关联性分析以及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作为理论层面的指导,阐释进行研究的可行性;从现实逻辑上看,主要从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发展需要以及数字技术有效推动作用,阐释出数字技术高速发展下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面临的新形式;从实践逻辑上看,通过引导数字技术应用的价值取向、完善数字技术应用的法规监管、正视数字技术如AIGC作用本质,阐述数字技术飞速发展境遇下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研究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

数字技术;文化治理现代化;逻辑;路径

1 引言

当今时代,数字技术作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面对数字科技、文化数字化以及数字文化经济的浪潮,以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我国数字文化治理现代化无疑是重要的战略选择。从理论、现实和实践的三重逻辑展开,深入分析数字技术赋能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可能、面临的新形势和路径选择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进而为助推我国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更好发展提供新视角和新的建设思路。

2 理论逻辑:数字技术赋能文化治理的理论来源

探寻相应理论资源、找寻数字技术赋能的理论归因是研究的关键起点。数字技术赋能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研究为何可行,需要探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技与文化治理的内在关联性分析,找寻理论上的支撑逻辑。马克思经典作家关于数字技术的原著论述并不直接存在。然而,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与科技发展、文化治理以及社会进步相关的思想,这些思想为理解数字技术在文化治理中的作用提供了理论框架和指导思想。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观与异化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通过强调资产

【基金项目】石家庄铁道大学研究生创新资助项目资助(项目编号:YC202434)。

【作者简介】何璐(1998-),男,中国河北石家庄人,在读硕士,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阶级统治下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成就，显现出科技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科技异化现象，如“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并“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如果说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再次强调了科学技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力提高的作用，同时进一步分析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科技异化的现象，指出“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机器“作为资本的承担者，首先在它直接占领的工业中成了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一切自然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在资产阶级社会形态下，马克思认为科技异化的根源在于科技的资本主义运用，资产阶级通过科学技术达到自身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目的，对工人进行压榨。在资产阶级的统计逻辑下，资产阶级借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压榨工人、影响环境、干扰治理能力、治理体系进一步建设^[1]。

虽然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未拥有 AI、VR、AIGC 等数字技术，但是后续学者通过对《资本论》中机器观点的进一步研究与分析，得到了机器与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在功能上的相似性，揭露了机器可以视为对人的能力的技术化延长的技术本质，那么数字技术如若被资本家滥用，同样会出现异化风险，对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进程产生阻碍作用。

2.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治理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提出进行共产主义的“精神生产”，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以实现“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进行文化事业建设、文化治理的立足点在于实现人的主体性，体现出推动文化治理进程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目标。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可以看出文化作为人们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真理性的检验与验证需要借助实践这一手段进行，实践则成为在文化的发展和对相应文化衍生问题进行治理过程中的重要方式。数字技术作为文化的载体和工具，借以实践的形式，通过促进文化资源的共享、创新和传播，能够推动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进而对社会进步产生积极影响。

综上，虽然马克思经典作家没有直接论述数字技术的直接性原著，但他们的相关思想和理论为我们理解数字技术在文化治理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框架。这些思想强调了科技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了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价值。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观与异化理论，又或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治理理论，亦或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体系最终落脚点——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这些思想为我们探索数字技术在文化治理中的应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这也为数

字技术赋能文化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3 现实逻辑：数字技术赋能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时代需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面对数字科技、文化数字化以及数字文化经济的浪潮，以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我国数字文化治理现代化无疑是重要的现实需要和战略选择。

3.1 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的赓续创新发展需要借助数字技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推进我国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文化治理的现代化的有效开展。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推进、智能产业快速发展的形式。文化治理现代化该如何有效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特征，新挑战呢？

国家领导人明确指出了下一步的努力方向以及有效应对的措施——文化与科技融合，即实现文化数字化。“文化治理，简单来说，是指遵循文化自身规律，主动配置文化资源与文化权力，以实现文化发展繁荣，促进文化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最大功能的一种治理模式。”随着 2022 年 5 月“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颁布出台，并对当前数字技术发展应用做出洞察分析，ChatGPT、AIGC 等技术为我国文化治理注入新兴活力。与时俱进、适时变革成为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2]。

3.2 数字技术可以有效助推我们文化治理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改善提升

随着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算法推荐、个性化匹配机制为精准匹配作用对象提供了技术支撑，通过算法的匹配，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文化传播内容。此外，数字技术中的信息回传机制，可以更贴心地根据用户反馈信息进行及时调整，做到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对于不同用户的“量身定制”，使我国文化治理更加精准化。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更多的便是调用算法进行信息匹配的作用机制，在文化治理过程中，海量治理相关的数据信息需要进行处理分析，相较于传统的治理机制，通过调用算法对海量数据进行全面的整合、剖析处理，提高了文化治理的效率。文化治理是需要进行高效精准化的数据信息产出，为文化治理现代化提供策略制定支撑点的过程。BI（商业智能）可视化模型便完美契合其产出需求，通过与数字算法匹配处理机制的联合调用，可以做到直观体现、全面分析、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能有效提升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的精准性，助推我们文化治理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改善提升。

4 实践逻辑：数字技术赋能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境遇下，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

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我们应采取引导数字技术应用的价值取向、正视数字技术应用的作用本质、完善数字技术应用的法规监管和筑牢数字技术应用的人才基础等举措。在顺势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浪潮的同时,促进推进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

4.1 引导数字技术应用的价值取向,为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阐明本质属性

伴随数字技术在生活中应用情况日益广泛,其具有的“头雁”效用逐渐显现,推动经济、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向智能化、网络化方向转变。在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工作过程中,需要始终把党的领导指引建设方向的原则。文化数字化是实现文化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关乎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进程推进,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现代化文明进程的根本性问题。国家领导人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科技创新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政治保证。我们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我国进行文化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属性是党领导下立足人民性的治理建设。其次,在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用数字技术的目的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立足更好服务人民的价值取向。国家领导人强调“人民的需要和呼唤,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时代声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新需求的产生。在人民群众的数据隐私保护文化愿景等方面提起足够的重视,充分发挥好数字技术带来的便捷优势的同时,做好相应的防范治理工作,以达到更好服务大众的目标。

4.2 正视数字技术应用的作用本质,为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明晰现实基础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数字技术的工具属性逐渐放大,过分依赖数字技术产物的现象频发。明晰技术手段应用范围,合理界定“人”“机”作用机理。在本质上,数字技术依旧是作为提高辅助人某种能力的存在,我们应借数字技术之便,结合人类主体的意志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建设进程。当今大数据技术飞速发展、AI技术大范围应用。在文化的传播与文化内容的自主生成方面做出引人注目的成绩,特别是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快速推动着文化生产内容方面产生颠覆性的变革,传统的文化内容生产需要生产者进行长时间的构思、措辞、修饰后,借助一定的工具形成最终的文化产品。而随着AIGC的应用,人类从创

作的主体转变成了“创作指挥者”,人机关系从原来的工具利用变成了人机协同生产。清晰明确地界定“人”“机”作用机理,合理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作用,以及处理好人机协同关系,将人的思考创造能力与数字技术的高效执行能力进行有机结合,善用数字技术助力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建设^[3]。

4.3 完善数字技术应用的法规监管,为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提供法治支撑

当前,我国文化数字化、数字技术赋能应用领域的法律法规尚存在一些欠缺。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用户的数据隐私问题、数字文化产品的相应产权等问题逐渐浮出水面。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通过算法和机器学习等,能自动生成或修改图像、文字、视频等数字内容创新了文化内容生产方式,但也带来了作者身份认定问题、作品认定问题、AI训练侵权举证责任问题等版权保护方面的挑战。面对这些新表露出的问题,政府机构应设立相应的委员会、制定相应行业的从业标准,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导向,加大相关事宜的宣传警戒力度。相关部门应在已有网络管理办法条例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为数字技术赋能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相关从业者应该从自身出发,加强数据安全、版权安全等相应问题的识别意识,自觉提高从业道德,加强法律意识,不做道德谴责、法律处罚的行为,在数字技术赋能应用的过程中加强守法、守德意识。为数字技术的有效合理应用提供健全法规监管,为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提供法律支撑。

总体来看,在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及赋能应用下,许多新的机遇伴随着挑战一并产生,成为影响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新的因素,文化治理现代化是我国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理论、现实和实践三个维度的分析,正确认识在建设道路中会遇到的挑战,并为今后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建设积极探寻解决路径与优化方案。

参考文献

- [1] 道格拉斯·凯尔纳,雷保蕊.文化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文化研究[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6(5):80-85.
- [2] 臧志彭,陈美欣.文化数字化战略能力跃迁机理及其实现路径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5(06):143-155.
- [3] 韩美群.国家文化治理:定位、内涵、特征与路径创新[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01):1-5.